

文学批评要有正确的批评态度

□泓 峻

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包含文学观念的生产、文学作品的创造、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接受等不同方面,而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必须建立在理论、创作、批评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之上。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可以指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中间或阅读行为完成之后,针对所阅读的文本而表达的感想、判断、评价。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则指的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行为。作为严肃的学术行为而存在的文学批评,承担着命名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文学流派,发现新的优秀作家、新的经典、新的文学动向,对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进行深度阐释的功能,在沟通作家与读者、重建文坛秩序、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甚至社会思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不仅要求批评者具备扎实的文学知识、良好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丰富的阅读经验;要求批评话语具有内在的理性能、能真正切入到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之中,准确传达批评家的艺术发现;而且还要求批评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文学效应甚至是社会效益。就一个具体的批评家而言,批评行为的有效性是显示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指标;而是否具有文学效应与社会效益,具有多大的文学效应与社会效益,则决定着整个文学批评活动以及批评家这个群体在作家、读者以及社会大众心目中,在文学格局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具有怎样的分量,占据怎样的地位。

由于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产生自一场主要由外力促动的裂变性的文学变革运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基本上是在贯彻发起者与参与者新的文学理念的过程中展开的,其后来的发展方向,也是被不断地调整、甚至重新选择的。因此,以各种新的文学观念为依托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对作家的创作与整个新文学的走向,曾经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谈到新文学的历史时,像胡适、周作人、茅盾、梁实秋、冯雪峰、周扬、胡风等批评家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活动依然对整个文坛与思想界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然而,最近20年来的状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中国当今文学批评的状况表示不满的声音,近年来不断出现,而且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之势,甚至到了开始有人怀疑文学批评究竟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的地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经典延续的方式
□李琳

随着新版《西游记》的播出,对文学经典的改编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对于改编,批判的声音往往大于赞赏的声音。这不仅让我们思考:经典是否可以被改变?经典的高度是否可以被超越,经典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小说《西游记》通过1986年杨洁导演的电视作品《西游记》而广为人知。其中,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这次改编,可以看做是对于小说《西游记》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的一次创造性的诠释。如今,张纪中版《西游记》出场,《西游记》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再编,戏中有戏、荒诞和搞笑,唐僧不再白白胖胖,孙悟空说话的本领远远大于其动作功夫,猪八戒成为搞笑的高手;白骨精也是前世有冤屈,和佛祖有亲戚关系的妖精都被救走了。这里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也有对现代时尚元素的加入等。面对这一改编,观众批评的声音和赞赏的声音同在。在新年伊始之际,影视艺术作品和大众娱乐共繁荣的场景颇值得玩味。

波兰文论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有四个层次构成,分别是语音层、意义单元层、轮廓化图式层和被表现的对象层,其中轮廓化图式层和被表现的对象层,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需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予以填补。影视作品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是一种在影像上将形象解读和转释的过程。《西游记》86央视版和之后的续集、浙版、张纪中版、周星驰版、张卫健版、陈浩民版,还有美国版和日本版等各种版本,塑造出了难以统计的《西游记》人物形象。86央视版的深入人心,和电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无以替代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先入为主”是每个欣赏者不可避免的惯性。后来的改编,体现了影视对于原著“不确定性”和“空白”的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时代文化元素和审美风尚添加其上的过程。例如新版《西游记》,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更加深刻,更加人性化,人情事理表现得更加鲜明。唐僧的形象更平民化,更像一个真实的僧人,孙悟空三人也是在经历途中“成长”,由“凡人”超越为“佛”,而且在讲降妖伏魔的故事同时,对佛理的思想理解更加深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经典解读“前理解”所决定的。

艺术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经典”,除去其自身的“原创性”和“陌生性”之外,时间的积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经典之谓经典,是为历时性的接受和实践的检验所决定的。经典不是僵化的被束之高阁、须仰视才能照面的现成之物,经典也是一种向着当下和未来敞开的存在。因此,经典不断地被改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人们一遍遍地改编,却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收获着阅读的惊喜和发现的快乐。

经典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是一种滋养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深厚土壤。经典一经被创作出来,就有了它固定结构和审美特性,但这种“结构和审美特性”只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具体化”为接受者的生命养分。具体化带来的结果首先是,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和体验的差别。英加登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可能以非常多的方式被接受,在作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各种理解和具体化都是合理的。”经典的生命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永恒的,因为经典蕴含着人类某些共同的观念、理想,属于特定时代的有高度的作品,并成为后代人学习、消化的范本;经典之所以是历史的,因为它所显现的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心目中永远在流变。面对同一个经典,改编者有不同的阐释,会把自身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所处的时代特点投射到作品中,只要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与心理需求,就会有成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也是一种创造。带着特定时代的“前理解”走进经典,创作出属于这一时代的、反映当今受众心声的优秀作品是正确的改编之路。改编的样式可谓多种多样,电影被改编为电视,如《手机》《杜拉拉升职记》等,影视作品本身被翻拍,如《倩女幽魂》《龙门客栈》等,而对于一些时代久远的经典作品,改编的成功,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追随原著,而在于把时代的美学趣味与经典文本的意蕴实现深度融合。当然,我们也应允许创编导以可能的方式去重塑经典。例如,新版《水浒》中潘金莲荡妇的形象被颠覆,新版《红楼梦》视觉盛宴挑战了人文情怀等等。人文文化正是在不断的解读与演变中,得到传承和创新的。

其实,观众对于经典改编的批评,并不是要否定改编这一创作现象,其深层意味在于拒绝没有文化底蕴、充满浮躁和媚俗气息的、肆无忌惮的对于经典的戏说、嘲弄和盗用,而呼唤经过精心雕琢的、体现时代美学趣味的上乘的改编作品的出现。毕竟,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经典,观众也需要通过对改编后的经典的接受,实现多方面的精神满足。



“古县·牡丹杯”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揭晓

本报讯 由河南省文联、散文选刊杂志社主办,山西省古县县委、县政府协办的“古县·牡丹杯”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颁奖典礼3月17日在山西古县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存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河南省文联副主席郑彦英,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占平等评委代表和获奖作家出席颁奖活动。

此项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评选活动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活动集中展现了本年度散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和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也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提高了散文创作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在业内业外获得了良好反响和高度评价。2012年初,散文选刊杂志社邀请李敬泽和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担任评委会主任,郑彦英担任评委会副主任,杨占平、甘以斐、穆涛、汪惠仁、贾兴安、何弘、李骏虎等担任评委,评选出年度华文最佳散文10篇。铁凝的

是多方面的,但是批评活动有效性的降低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从事专业文学批评的人数也许比新文学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一支庞大的从事文学批评的队伍,所以每年产生的可以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报刊文章、学位论文以及学术论著不计其数,表面上看似乎一派繁荣。然而,谈到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时,人们普遍的感受却是批评的“失语”、“缺席”、“乏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从整体上讲,当下的文学批评很少对当下文坛的走向、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当下现实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许多时候,文学批评成了批评家自己的事情,甚至异化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争基金、拿奖项的工具与手段。

这种状况,的确应当引起文学界,尤其是批评家的认真反思。

二

客观地讲,近20多年来,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批评界不是没有进行过策略的调整与方法的探索。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去认真审视中国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时,却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莫衷一是,调整与探索的过程仿佛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怪圈,越走越让人感到困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使文学批评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认为“文学批评是科学,应该遵从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原则”,“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但是,在相同的背景中,面对相同的问题,也有一些批评家反对理论化的文学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理解为批评家精神的独立性,认为文学批评的文体应该是富有灵性,不受拘束,以我为主,甚至主张“批评就是批评家批评自己”,“批评就是创作”。

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商业大潮汹涌澎湃,大众文化崛起的情况下,被认为

具有“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尖锐性、普及性”的“媒体批评”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媒体批评”,特别是被商业利益所渗透的“媒体批评”过于主观随意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再加上学术思想界对1980年代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反思,于是出现了强烈的建立文学批评学术规范的呼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如今,至少在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期刊上,格式严谨、语言规范、逻辑绵密的“学院式批评”成为绝对的主流。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是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代表的“外部研究”泛滥,进而提倡“内部研究”,使得围绕文本进行的纯粹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盛行。但是,不久就有人惊呼,对文学的封闭研究遗失了文学批评许多鲜活生动的内容。于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批评界迅速转向,重新向政治、向意识形态、向社会历史开放,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开始走红。

对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借鉴,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在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下的批评,往往是为理论而理论,许多批评文章实际上是食洋不化地套用西方某些批评理论的现成模式,丰富的作品与文学现象只是被批评家用来自做对某一种理论作转述和注解的实例,批评家对所要批评的作品与文学现象本身并不感兴趣。于是,有人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概念对汉语写作缺乏有效性,因而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范畴及其固有的批评方法,希望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解决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单独地看,上述意见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应该说,它们都从特定的视角切中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弊端。但是,实践证明,沿着任何一个方向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进行的改造,都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其在整个文学格局与文化格局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趋势,甚至使问题

变得更加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不是出在批评策略、批评文体、话语方式这些技术性的层面,而是出在更深的层面,出在批评主体身上,与参与文学批评者的批评态度有关。具体地讲,就是当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往往会有许多现实利益的考量,批评家们很容易在文学批评活动当中,掺入一些非文学的、不利于文学批评活动有效开展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文学批评的质量,影响到文学批评的针对性,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

如果讲批评主体的外在条件,当今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学历层次、接受教育的完整性、专业化程度等等,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可能是最好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现今的批评家所处的环境也是最复杂的,其所受到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现实利益的诱惑也可能是最多的。在各种现实干扰与利益考量下,文学批评活动是否能够对作家、读者与社会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否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是否能够真正地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许多时候不再是批评家首先考虑的因素。对有些批评行为而言,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如果批评家没有很强的对文学、对社会、对时代的使命感的话,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根本就无法谈起。

认真分析起来,近年来非文学因素对文学批评活动的干扰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学术体制内部获取学术利益的工具。当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绝大部分在高校。受高校内部学术体制的影响,许多人文从事文学批评的最直接的动机是累积科研成果,用以取得学位、晋升职称、申请与完成科研基金项目、获得科研奖励、争取博导资格等等。

二、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地方政府制造“文化繁荣”局面的工具。许多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把自己管辖范围内出了多少知名作家、有多少作品获奖当成政绩的重要

指标,而文学批评又被认为是扩大作家与作品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今的一些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有组织地生产出来的,许多批评家出于种种很现实的考虑经常参与其中,甚至乐此不疲。

三、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实现商业利益的工具。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出版商在出版文学作品的时候,不仅借助于广告进行营销,而且也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有效的营销方式。在由出版商组织的具有广告性质的文学批评当中,不乏从事专业文学批评者的身影,甚至一些知名批评家也常常卷入其中。

至于受作家朋友之托进行的文学批评,碍于各种各样的情面而在批评当中回避问题的批评,自古就有,于今则更甚,这同样会导致文学批评的异化。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异化的存在,出现了大量表面上规范严谨,却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琐碎拉杂,为批评而批评的文章;出现了大量架势吓人,术语概念满篇,却内容空洞,不触及任何具体问题的文章。与此同时,在参与地方政府运作、商业运作的文章中,在过多考虑人情世故的批评家的文章中,则有太多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词,太多违背常识的价值判断,太多有损尊严的违心之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作家、读者、文学史家真正把文学批评当回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自然无从谈起。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借助于西方理论还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是走学院式批评的路子还是走感悟批评、媒体批评的路子;是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还是用形式主义,或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的方法,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批评家对文学怀有真诚的热爱,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事业,当成参与当今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批评,采用任何一种文体,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写出好的、具有影响力的批评文章。相反,如果批评家被各种非文学的因素所左右,缺乏定力,缺乏对文学事业的真心热爱,缺乏对文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那么任何一种批评策略与技术的改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当代文学批评的颓势。要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必须从批评家的自省开始,必须从批评态度的改变开始。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6)



美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蒋晓丽

读彭立勋研究员的美学研究新著《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让我想起黑格尔关于美的界定,“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也许可以说,趣味就是“感性的别名”,而理性,则是相对于“趣味”或“经验”的概念界定。近代西方美学无疑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趣味与理性已然形成两大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代表性思潮。经验主义或趣味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美学乃至文学艺术内部两大不同主张,但它们的指向其实都是面对人的美学艺术思维的本质的。

对于包罗万象的西方美学地图来说,英国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无疑是两个大值得总结与梳理的重要流派。趣味主义美学作为经验主义的别名,顾名思义,是以“趣味”为最大人生价值的哲学美学观念。这一流派,对解释美的来源、美的形态、美的定义,有着重要的代表意义。美本身就是一种颇具趣味的事象。在该书中,作者对趣味主义美学的研究述评,重点涉及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作者通过对16世纪至18世纪经验主义趣味美学思想理论特色与内涵的探讨,对美学与哲学、文学之间逻辑关联的探讨,对西方尤其是英国趣味美学的梳理及个性化创构的探讨,使得我们对西方趣味主义美学的来龙去脉、主要论点和观点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对经验主义趣味说的概括总结中,作者的相关阐释,资料翔实,论述准确,条分缕析,有着丰富深刻的学理意蕴。

与经验主义、趣味主义相对的乃是理性主义美学。其代表体系为解释学美学(Hermeneutic),是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学流派,近代解释学的基本特点是客观主义,强

调忠实客观的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德国“理性主义”美学(亦称新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研究,形成了“理性派”,哲学研究则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这一流派主张,只有符合理性内容、合乎逻辑的明确严整、部分与整体配合才是美的。由于理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故由理性所产生的美也是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美学相对趣味主义美学,显然有着自己的优越之处,它让我们在认识美、判断美的过程中,具备了可以衡量的抓手,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理智了。就艺术创造而论,它不再停留在“美是生活”的表象层次,而更注重典型性,给予美的典型要素的科学言说,而不是对于现实的机械模仿,简单复制,这就与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当然,理性美学也有它的弊端,如果把握不好,很可能滑向对于美、对于艺术形象的先入为主的判定,变成“席勒式”的概念化表达。对此,该书的梳理和介绍,无疑体现了作者对于西方美学体系的深刻理解与精湛见地。

当代美学研究成果证明,无论是经验主义美学或者理性主义美学,其研究的重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都是围绕着认识论问题而展开的。尽管这两个派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然而正如鲍桑葵所说,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思想着、感受着和知觉着的主体”。两者都高扬审美主体的作用,只不过一方强调的是主体的感觉经验,而另一方则重视主体的理性思维。该书紧紧围绕这两个近代西方美学派别的显著特征,将认识论转折影响下产生的美

学研究向审美主体的转变,看做美学思想由古代和中世纪迈入近代的关键,高屋建瓴,统观全局,出色地理清了这一时期西方美学发展的脉络。

作者抓住经验主义趣味美学与理性主义美学的主干,对它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观点,加以自己的发挥性评说。在构思和撰写该书过程中,作者多次改变结构和写法,不受任何既定的研究和写作模式的限制,主要从充分表达思想内容出发,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模式和写作方式,是历史性研究与思想性研究、宏观性研究与微观性研究、纵向考察方法与横向考察方法、阐释方法与比较方法等,能够互相结合,优势互补,形成有机统一,从而对经验主义美学和理性主义美学各自的特点和关键理论作出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分析,从整体上认识两大美学派别和对经验主义美学或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互相影响从而推动近代西方美学向前发展的基本规律。应该说,这是美学研究课题的重点和难点,也最容易形成该领域研究的亮点。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创新性、探索性,也是美学界、学术界对该书最为欣赏和褒奖的地方。

最后,用美学家汝信的一段话作为结论:该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对16世纪末至18世纪这两百年来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并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作者不是孤立地谈美学,而是紧密地结合当时西欧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联系影响美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西欧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美学派别的产生、发展和彼此交锋乃至相互交融的过程。并对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新意迭出,从而大大超越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研究成果。

本报讯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修订版)》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从1954年到1996年的40多年间发表过的所有诗歌作品,共约160首,全面反映了作者在这段时间的创作历程。书末还附有诗人的自传章,对研究和了解诗人的诗歌作品具有重要作用。据悉,《特兰斯特罗默诗选》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的一辑,由董继平翻译。在本次修订时,董继平针对原译著进行了锤词炼句、精雕细琢,使诗歌读起来更加鲜活生动,并将作者笔下的那种“内心的深度、新奇的语感、独特的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3月24日,河北教育出版社还与搜狐读书频道共同在京举办了主题为“走近特兰斯特罗默——诺贝尔的选择:抢救大师”的读书沙龙活动。学者止庵、诗人蓝蓝和董继平等嘉宾围绕特兰斯特罗默及其诗歌创作等话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王 兔)

河南举办傅爱毛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河南文学院举办了傅爱毛作品研讨会。南丁、张宇、何弘、黑白、乔叶、李静宜、刘宏志等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傅爱毛关注社会最底层最边缘人物的命运,对他们的人性粗直进行了深入剖析,让人为之动容与反思。傅爱毛的创作风格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因其笔下人物的特别、写

作中的奇思妙想甚至荒诞,彰显出人性的关怀和文学的力量。在傅爱毛作品中,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物,总是以实际行动完成各自人性的救赎,他们在最深的困顿中,仍拥有最顽强的努力与坚持。她虽然关注的是苦难,作品却充满了温情及希望。(奚同发)

推出修订版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